

譚達先博士與澳門

段寶林*

譚達先博士駕鶴西行已經五年多了，早就想寫一篇文章紀念他，但一直沒有時間。幾年前收到黃曉峰先生的來信，促使我拿起筆來。等到開始寫作時，卻又感到想寫的事情太多，在此文中祇能把最重要的寫一些。這主要就是關於民間文學的回憶，特別是與澳門的關係。

在民間文學方面，我與譚達先博士的精神聯繫，已有五十年之久。譚達先先生是我敬佩的民間文學同行，是一個非常誠實而勤勞的學者。我在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書的兩年中，正好他的家也在澳門，我們在一起有過許多愉快的合作和交往，難以忘懷。而在這之前，我們已經有了許多聯繫。應該說，我們都熱愛民間文學，是心心相印的知心朋友。

“文章不寫一句空”

我們都是教民間文學的。此行在全國為數很少，是周揚所說的“文藝界的稀有金屬”。在上個世紀的60年代，由於教學計劃中民間文學由基礎課變為高年級的專題課了，同行們紛紛調去教現代文學、文藝理論、寫作等基礎課，當時全國堅持教民間文學課的，幾乎祇剩下了我孤零零的一個人。

我是1958年從北京大學畢業的，原先搞文藝理論，沒有學過民間文學課，祇領導三年級學生選編過十幾本歌謠集和一本民間文學教材；想解放思想，要給中外學生講民間文學課，備課卻困難重重，因為當時民間文學的理論書非常之少。我深感這個“冷門”非常難搞，有時簡直一籌莫展。

就在我十分困難的時候（1959年），譚達先出版了兩本書：《民間文學散論》、《民間童謠散論》，內容非常充實，這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不

啻為鳳毛麟角，猶如大旱遇甘霖，使我有喜從天降之感。

這兩本書一直是我民間文學教學中離不開的參考書，受益非淺，前幾年我還建議他再版印行哩，我相信那是有長遠學術價值的。後來他出版了《譚達先民間文學論文集》，把這兩本書中的文章幾乎都收納進去了。

據他自己說，為了這兩本書，他在北京和廣州的許許多多圖書館中查閱了書刊上幾乎所有民間文學的材料，做了很多筆記。從此他就愛上了民間文學，認為寫文章一定要從材料出發，決心做到“文章不寫一句空”。

這就是他最初打下的牢靠基礎，是他的光輝起點。“文章不寫一句空”成為他一貫的寫作風格。

深夜中的秘密寫作

在1966年伊始的十年動亂中，他在廣州中山大學被打倒了，我在北京大學也不能搞民間文學了。但是，令人難以相信的是，他在文革動亂的

* 段寶林，中國民俗學專家，北京大學教授，其專著之一《中國民間文學概要》於1996年獲意大利巴勒莫人類學國際中心大獎“彼得獎”，2007年獲中國文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山花獎“民間文藝成就獎”。

恐怖氣氛中，冒着很大風險，堅持秘密寫作了許多民間文學著作，如八卷本的《中國民間文學概論叢書》，共一百多萬字，後來分別在香港、臺灣兩個商務印書館出版。

他曾在信中告訴我，他在當時寫作的情況和一些細節，那簡直是令人難以想象的。

半夜三點鐘他就起來寫作，中午從不休息，搶時間抓緊寫作。為了怕被抄家失去稿子，他用複寫紙眷寫三份，悄悄交給三個朋友，分別保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文革之後極“左”的影響仍然很大，就在四人幫垮臺後的1979年，他寫的《中國相聲藝術初探》、《中國曲藝學》等三本書，仍未得到當時中山大學中文系某領導的“批准”，黑龍江、安徽兩家出版社雖想出版卻不能出，那三本書終於胎死腹中。多麼可惜，可能永遠也未能出版了，也不知原稿流落何處？

大陸學人在香港的磨難

直到1988年，我終於第一次見到了譚兄。他在1980年移居香港，作為香港學者參加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在珠海－深圳召開的“中國民間文學理論研討會”。

他談起他在香港的遭遇，令人不寒而慄，許多事更令人難以想象，於此才知譚兄為了研究民間文學克服了多麼大的困難。

當時他已在香港出了十幾本書，但因香港英國殖民主義者不承認大陸學歷與教齡，這位著作很多的中山大學講師，在香港竟沒有資格上教壇教書。

他祇好重新去香港大學攻讀，1984年取得碩士學位，然後還要攻讀博士，等到1991年才拿到博士學位，當時他已經是六十六歲高齡的老人了。

那博士的水準，他本來早已達到，甚至遠遠超過了，按常理早就可以畢業的，為甚麼卻要拖他個七八年呢？

因為在香港高校指導博士論文是要算導師的工作量的，那位指導他的副教授，為了自己的工



中國民間文學研究家、民俗學家譚達先博士遺照

作量竟遲遲不讓他畢業；因為指導他並不費力，每學期祇要見一兩次面，可以很容易得到工作量，所以能拖就拖，使他這位六十多歲的老學者拖得疲憊不堪身心交瘁，辛辛苦苦白白地拖了好幾年光陰才拿到一紙學位證書。

他在攻讀期間，生活非常困難，沒有獎學金，全靠自己籌集學費。而他在香港不能教書，祇能偷偷給別人代課，教夜校、教中學，在承擔繁重的教學工作的同時，還須去攻讀學位，還得給報刊撰稿爬格子謀生。

香港殖民主義當局的各種規定，對大陸去的華人是非常苛刻而可怕的，真可謂如佈下了天羅地網，簡直讓人有翼難飛。

按常理，譚先生在香港拿到了博士學位，是應該能夠在大學教書了吧！令人難以想象的是，在獲得香港大學的博士學位以後，他還是不能在香港教書。



為甚麼？因為香港殖民主義者還規定：一定要大學本科在香港畢業的，才能在香港教書。因為大學本科他不是在香港讀的，所以他在香港教書仍然是非法的、偷偷摸摸的，如果被查出就要被解僱，就又要去找新的教職。有時香港不行了，他就到澳門，所以他也曾短期在澳門東亞大學中文系教過書。

令人特別感動的是，出於對民間文學的熱愛，在這動盪不安和教務極其繁重的情勢下，達先兄仍然不中斷民間文學的研究和寫作，在香港和內地發表了許多文章。

1983年他把曾在香港文匯報、東方日報、廣角鏡和廣州日報等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彙集為一本《民間文學隨筆》在他的故鄉廣西出版。

1985年，他應日本民間文學權威君島久子教授的邀請，參加在日本大阪召開的中日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在會上做了〈中日民間故事比較研究初探〉的學術報告。

他遍尋香港各大圖書館中的港臺和國外民間文學書刊，都做了割記。根據這些材料，他在深圳的大會上做了一個極為精彩的發言，介紹港臺和國外的民間文學研究情況。這在改革開放之初，使我們這些從沒有邁出國門的大陸學者，瞭解到許多新鮮的知識和資訊，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我們感到譚兄雖然離開了大陸，但他的心始終是和我們連在一起的，可以說他是我們的一位傑出代表。他在發言中根據我們的需要，有針對性地介紹海外情況，講得非常親切，令我們頓時有解渴之感。

為兩岸文化交流盡力

除了在會上滔滔不絕地講了許多海外民間文學研究、出版情況之外，他在會下談得更多。我記得在一個晚上，我和北師大張紫晨（子臣）老師一起去他的房間，同他一直談到深夜，還戀戀不捨；離開時他贈書給我們，送了在香港出版的《民間文學概論》。

我也送他我剛出版的兩本書《民間詩律》和《中國民間文藝學》，並託他把這兩本書各帶一本給臺灣的朱介凡、妻子匡兩位老先生。他非常負責任，在赴臺開會時帶去了臺灣；但因臺灣當時禁止簡體字的書刊入境，他又輾轉託人從國外帶進了臺灣，因為臺灣海關對海外到臺灣的旅客檢查比較鬆。

朱介凡老先生看了我們的書，非常高興，還專門寫了文章，盛贊《民間詩律》是非常重要的學術成果，“實前人所未有”。據說臺灣清華大學的王秋桂教授還把此書全部複印帶入了臺灣。

為了在臺灣提倡民間文學，譚兄前後在臺灣出版了十幾本書。臺灣許多大學的民間文學課，都用他的書做教材。後來發現有盜版的《民間文學概論》，他將此書一套八本在臺北商務印書館又正式出版了一次。

譚達先先生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為兩岸的文化交流做了許多工作，真是不辭勞苦，盡心盡力，令人感動。

我們在澳門合作編成了兩本書

1995到1997年，我在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書共兩個學年。

澳門大學的前身是東亞大學，譚兄曾在此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哲學”等課程。

我的課講得比他多些，中文系的文學課幾乎都講，每週十二節課。在講課中，我注意發揚我所有的民間文學教學優勢，結合各種課程，盡可能讓學生做些民間文學調查。

在講“鄉土文學”、“民歌與新詩”等專題課和大課“寫作課”時，我更讓學生做作業——調查澳門的民間文學和民俗，這大大地提高了學生的寫作能力。這是在大陸早已有的成功經驗。

李觀鼎先生曾講過多年寫作課，在我上課前，他對我說，澳門學生的作文，一般就寫五百字，但我在佈置他們寫民俗調查報告和民間文學記錄時，要求他們寫的字數越多越好。結果大大



出人意外，很多學生調查民間文學和澳門民俗之後，調查報告和作品記錄竟寫了一千字以上，有的甚至寫到一兩萬字。

我於此得到了許多學術資料，學生們得到了好的成績，大大鍛煉了學生的調查與寫作能力。

澳門學生原來為甚麼寫不出文章呢？主要是不知道寫甚麼。我讓他們寫民俗、民間文學的內容，這些都是他們最熟悉的生活文化：怎麼過年、怎麼做遊戲、怎麼做菜、怎麼結婚等等；至於記錄故事歌謠、諺語等等民間文學作品就更容易了。所以他們經過一些訓練，認識到民間文學的重要性，掌握了忠實記錄、立體描寫的科學方法，經過調查、回憶，就可以寫得很多很多。這結果大大出乎他們自己的意料，得到了意外的驚喜。

後來我帶回了兩大箱澳門民俗和民間文學調查資料，還組織學生編寫了澳門第一部《澳門民俗大典》，由研究生禰偉旗、胡國年主編，共一百萬字，2005年出版了厚厚的一大本。

此書受到馬萬祺、何厚鏵等澳門領導人和澳門基金會等單位的大力支持，還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首發式，受到北京學界的高度評價。當時的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北京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趙書先生說：“澳門卷已經出來了，這麼漂亮，內容這麼豐富，我們北京卷要急起直追才行呀。”（北京新京報報導）

在澳門，達先兄家住鵝眉街，我常與他見面。曾一起到崗頂老人堂去聽百歲老人講民間故事，聽得津津有味，真是非常有意思。

後來當我把學生收集記錄的幾百篇澳門民間傳說、故事、歌謠、諺語給他看時，他更是大吃一惊，說：“我以前曾在香港和澳門收集過澳門的民間文學作品，但卻一篇也沒有找到，當時就以為澳門沒有民間文學了，沒想到竟然有這麼多呀。”我當即把全部資料都交給他。他看後說：“這些記錄太好了，很符合科學規範，希望能編成書出版。”

當時我一週十幾門課，教學任務很重，決定邀請他和我合作，共同編書。他愉快地答應了，

說：“你收集，我整理，很好。”我們就這樣進行了合作。

譚兄工作起來是非常認真的。他曾經編過一本廣東省的兒歌集，在廣州出版。大概是因為廣東人看，所以對廣東話沒有多少註解。

我認為，為了發揮更大的作用，書中的澳門歌謠、諺語和傳說、故事裡的廣東話都要有註解才好，不然，外地人看不懂，就起不了多大作用。

這無疑增加了譚兄的負擔，而他卻愉快地擔當起來，非常認真地進行註解和分類，結果編成了兩本書：《澳門民間傳說故事集》、《澳門民歌、謎語、謠諺集》。

達先兄非常認真地複寫了三份，原稿交澳門日報一位副總編審閱，希望能在澳門日報選一些先行發表。在報紙上發表，影響極大，並可通過報紙發動群眾進行民間文學調查。那位先生認為這是很重要的歷史資料，可以由澳門歷史學會出版。我在離開澳門回北大時，把同學們調查記錄的原稿也交給那位先生了，這是澳門的重要歷史文獻，應該妥為保管才好。非常可惜的是，不知何故，這兩本書至今仍未出版面世。

高水準的《澳門民間文學研究》

雖然其作品未能出版，但達先兄的研究文章卻寫了不少。

我們在編《中華民俗大典》時，請他給“澳門卷”寫了民間文學部分。他對澳門的民俗和民間文學代表作品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介紹，後來又寫了多篇論文，專門就澳門的神話、傳說、笑話、歌謠、謎語、諺語等等做了深入的探討，彙編起來，竟然出了一本十八萬字的專著《澳門民間文學研究》，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原來想盡量吸引達先兄這樣的專家來研究澳門民間文學，這是澳門所急需的。因我曾向澳門文化司署申請過一個研究民俗的項目，知道條件優厚，所以也建議他去申請，這或許也可以在



經濟上給他一些幫助。他果然申請了澳門民間文學研究的項目，2001年得到批准，一年時間即寫成此書，並已列入“澳門叢書”2006年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當我收到達先兄從澳大利亞寄來的這本份量頗重的專著時，真是欣喜萬分。後來他又兩次來信希望我能寫一篇評論文章，並說要收入即將編成的論文集，“作永久紀念”云云。盛情難卻，我當時曾將自己的感受和學習心得，寫了一篇小文，還未來得及發表，譚兄卻已離去，令人不勝淒愴！

下面就把我的這些意見，簡略地寫出來，請大家指教，並作為對譚兄的一個永久紀念。我認為這本研究論著是研究澳門民間文學的第一本專著，同時也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中的一本水準很高的專著。

資料豐富新穎史無前例

首先，我認為此書資料的新穎和豐富，是史無前例的。書中引用了大量的民間文學作品，都是許多澳門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們新近幾年收集得到的，以前從來沒有人收集過，而且數量那麼多。這幾百篇民間文學作品，奠定了本書牢靠的學術基礎。

本來，我在澳門大學發動學生收集民間文學作品，是為了自己進行研究專用的，但因課業太多，無暇分身，回京後又忙於《中華民俗大典》的總主編工作，所以我早已把收集得到的全部資料四百五十多篇，都交給了譚兄，我認為他對廣東民間文學和廣東話非常熟悉，一定會比我研究得更好。

有人說：“你怎麼把自己辛辛苦苦收集來的作品全都給了別人呢？”我覺得為了澳門民間文學研究得好，這樣做是應該的。實際上，結果也是很好的。如果沒有那四百五十二篇新記錄的作品，譚兄這樣的大專家就會英雄無用武之地，怎能寫出這本專著呢！

君子成人之美，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事。

但譚兄的著作也並未局限在這些作品之中，他還千方百計從《澳門紀略》等古書上和國內外書刊，如臺灣朱介凡先生的《中華諺語志》、金榮華教授的臺灣故事調查研究著作中，盡力收集了一些與澳門有關的民間文學作品，進行深入研究。所以譚兄的這本著作依然保持了他一貫的特點——資料豐富、充足，毫不空泛，這是很不容易的。同時，這也是它最有參考價值的重要因素之一。

更為深入的比較方法之應用

其次，譚兄的《澳門民間文學研究》一書，應用了國際上流行的比較研究方法，把澳門民間文學作品同國內外的同型作品作對比，這就突顯了澳門作品的個性與共性，便於作更深入的分析。

例如：對澳門的神話故事〈天為甚麼像現在這樣高〉這一作品，書中羅列了臺灣高山族的〈天上、人間、地下〉、〈太陽與月亮〉，澳大利亞土著的神話傳說〈獵手與妻子〉、〈羅諾馬拉與星星〉，漢族的故事〈天怎樣昇高的？〉（廣西南寧）、〈天是怎樣變高的？〉（湖北），〈天為甚麼這樣高？〉（臺灣東部卑南族神話）……

對許多同型故事的異文，他進行了細緻的對比分析，從而得出了可靠的結論：“澳門此篇不失為同型神話中的簡短精品。”同時指出，它具有“人可制天”的積極思想，是很可貴的而在藝術上，則有“藝術結構的層次性與樸素自然、明白簡潔的口語風格”。

這種比較研究需要有廣博的視野和深厚的學養，不是一般人可以駕馭得好的。

比較研究方法是此書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但譚兄並不像國外流行的那樣，祇作情節形式的簡單對比，而是結合作品的內容和藝術特色，進行綜合比較，所以比一般的芬蘭學派的歷史地理方法更為深入。



又如對颶風傳說的比較，對“用牛皮量地”型傳說的比較，對“西洋菜傳說”、“海市蜃樓傳說”的比較以及對“月光光”型兒歌的比較，對“一歲嬌”童謠的比較和對“賣懶謠”的比較等等，都不僅祇比較情節和形式，而且對內容做了深入的分析。書中通過對澳門、粵中與寧波的“颶風傳說”的比較，認為：

玉皇颶、關帝颶、彭祖颶等三地均有，具有全國性；而鬼颶、佛子颶、彭祖婆颶、洗炊籠颶等則為粵中所特有。澳門與寧波所共有的則有：水仙颶、太保颶、東嶽（朝天）颶、冷風（信風）颶等。澳門所獨有的尚有十種：白龍颶、龍母颶、太白颶、張良颶、西嶽颶、竈君颶、翁爹颶、普庵颶以及臘月廿四日的掃塵颶、廿九日的火盆颶等。

譚兄在分析中指出：

這些對颶風的傳說，表現了澳門人對大自然的神話想象，反映了澳門的地理、歷史、文化因素，這種想象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民間文化大寶庫，也正是最可貴的重大的學術價值所在。（頁31）

關於“用牛皮量地”傳說的歷史價值，達先兄經過比較，糾正了前人不妥的看法。如《澳門紀略》的校註者在註中指出：這個傳說故事“多為時人傳說，並無事實根據”。這種結論是缺乏學理性的。書中引用歷史文獻《瀛寰志略》中的記載，說明西班牙人早在明代隆慶年間（1567-1572）在菲律賓已經用這種方法巧取豪奪佔領了呂宋島。這是歷史的記錄，是有事實根據的。

《澳門記略》中的記錄，口傳藝術的色彩較濃，但它仍然是有歷史根據的。當然，這是指廣義的“大歷史”，即殖民主義者在東方侵土略地時的狡詐和兇狠。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傳說的歷史價值正在於此。它是一種口傳的歷史文學，所以書中批評《澳門紀略》的校註者說它“並無事實根據”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近似勉強”的說法。

在歌謠的比較研究中，對〈月光光〉童謠的研究最具功力。〈月光光〉是一首廣泛流傳的歌謠，譚兄對澳門、廣東、香港三地的這首同型歌謠進行了非常細緻的分析。書中指出，香港祇有一篇異文，廣東各地的記錄也不多，而在澳門卻有十三首之多。

他過去曾編過《廣東童謠、歇後語、客家情歌》，對〈月光光〉尤其熟悉。他舉出其中幾首篇幅較長的、知識性的異文，澳門五篇、廣東一篇、香港一篇進行比較，發現這首“聯珠格”的三言歌謠由自然知識開始，一直唱下去，最後竟唱到反帝的內容：

月光光，照地堂（院子）。
年三十，摘檳榔；
檳榔香，摘子薑；
子薑辣，買蒲達（苦瓜）；
蒲達苦，買豬肚；
豬肚肥，買牛皮；
牛皮薄，買菱角；
菱角尖，買馬鞭；
馬鞭長，起屋樑；
屋樑高，買張刀；
刀切菜，買籬蓋；
籬蓋圓，買隻船；
船沉底，浸（淹）死幾個番鬼仔！
一個蒲（露）頭，一個沉底！
一個摸茨菇，一個摸馬蹄（荸薺）！

譚先生發現這首澳門的歌謠異文，是最長的：前半段與廣州的一樣，祇是最後幾句不同。

廣州的一首異文是“浸死兩個鬼仔”，另一首其中異文卻是：



買隻船，船無底，
浸死一家大細（老小）！

番禺的一首異文是：

買隻船，船無底，
浸死蛋家仔（水上居民）！

新會的異文則是：

買隻船，船沒底，
浸死兩個紅毛番鬼仔！
一個剝茨菇，一個摸馬蹄！

這些〈月光光〉的異文，大同小異，前面全是自然知識的內容，可以使兒童知道許多事物，具有幽默感與特有的情趣；最後幾句則轉向社會內容，變為攻擊性的諷刺或咒罵。大約以前嘲笑的對象是指終年漂泊的水上人的，後來西方殖民主義者來了，就嘲笑“番鬼仔”，於是帶有反帝的性質。

書中經過仔細的對比研究，指出澳門在這方面最為突出。“澳門兒歌所隱藏的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意識，遠比廣州兒歌強烈得多。”深入追問其原因，他從1553年葡萄牙人到澳門的歷史，指出：

上引澳門兒歌，保存下一些反帝意識，就多少蘊含着澳門人民對葡萄牙人欺負中國同胞的不滿情緒，這是歷史的回聲，有認識澳門歷史的科學價值。這也是此首兒歌區別於他地同型兒歌的可貴之處。（91頁）

澳門的〈月光光〉數量最多，而且直指番鬼仔——帝國主義者。新會的“紅毛番鬼仔”指的是荷蘭侵略者。香港的一首在後面還有所不同：

買隻船，船沒底，
浸死三個番鬼仔：
一個蒲（露）頭，一個沉底，
一個匿埋（秘藏）門扇底，
偷食油炸鬼。

譚兄經過比較認為：香港這首和澳門的大體相似，都是嘲弄落水的四個洋人，但香港這首似有瀕海商業城市生活氣息，而澳門的那一首雖有航海商業內容，但後兩句“或摸茨菇，或摸馬蹄”——這是兩種水生植物的根，則和農業有關，這是澳門特色，這兩種植物都生在水底，表現洋鬼子“沉底”後在水中摸來摸去的情景，多麼富於動態的幽默感，“這結尾反映的內容，比香港兒歌要豐富些”，由此他還進一步得出結論：

澳門兒歌在內容上、藝術上，具有自己特有的風采與特色，呈現出澳門人民深邃的思想，豐富的生活，多樣的知識，可貴的智慧和口頭創作的卓越才華。正因如此，它豐富了中國傳統的民間兒歌寶庫，很值得學人們認真探究與高度評價。（95頁）

總之，據筆者所知，〈月光光〉型兒歌，在澳門多達五首（實為十三首），遠比廣州、南海、番禺、新會、深圳、香港等地區為多。（……）可見澳門保存於民間口頭上的兒歌更為豐富。（94頁）

這是對的，澳門由於種種原因，在民間保存下來的口頭文學作品，不僅品質較高，而且數量也相當多。

當然，這並不能說明廣州等地的數量就少。據我看，這主要和調查方法有關。

過去，在進行民間文學調查時，一般都不知道盡量收集各種異文。在收集時，祇要聽到“月光光”的篇名，就以為過去已經記錄了，不用再記錄了。以為每首歌謠，祇需要記錄一首就行了。當然數量就少了。這就是廣東、香港等地數量之所以少的主要原因。



我在澳門大學指導學生調查民間文學時，運用了最先進的立體描寫方法，強調要盡可能記錄各種各樣的所有異文，因為，民間文學是立體的文學，每一種異文祇是它的一個側面，全部異文的總和才是它的完整的全貌。所以，就需要記錄許許多多的異文。這是先進的立體描寫科學方法的優越性；同時，也是澳門民間文學十分豐富的表現，如果不豐富，方法再先進也不行。

這種立體描寫的方法和民間文學立體性的新理論，是我在80-90年代提出來的創新理論，曾受到許多年輕人的讚同；經讀者投票，1985年獲“民間文學論壇”銀河獎，成為民間文學銀河中的一顆星。

當然，一些老專家則不一定能接受。譚兄的思想比較新潮，他也很內行，故而對新理論不但不反感，反而很歡迎。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1997年我的論文集《立體文學論》在臺灣文津出版社出版時，譚兄見了立即寫了書評〈新穎創見 成就卓越〉，給我的理論創新以很大的鼓勵。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使我特別感動。

我們知道，一種新理論的出現，往往要遭遇到人們習慣勢力的很大阻力，甚至受到冷遇。例如，我的《立體文學論》早在1997年就已經在臺灣出版了，但在大陸則遲遲難以出版，直到十年之後的2007年，才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面世。

當時譚兄已經年近八十，對新事物、新理論如此敏感，那麼快就寫了一篇詳細的書評，對書中內容做了很具體的分析，實實在在，毫不空洞，真是大家風度，令人感動！他對民間文學的立體性理論、史詩研究、笑話的美學價值、水滸書的比較研究等文章都做了評述，認為這些理論創新“突破了舊說，闡明了新意，等等，均各見精彩，很吸引人。(……)總之，這是一本理論上深具創造性，且富有文采的專著，能啟迪人增強研究中國文學的信心與自豪感，趣味盎然，很值得細讀”。(段寶林《立體文學論》頁450，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這是他的讀後實感，娓娓道來，令人感動。

除了對〈月光光〉進行了很好的研究外，書中對〈一歲嬌〉型兒歌，也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歷史地理比較研究。譚兄指出：

澳門著名的〈一歲嬌〉型民間童謠，在民間流傳大概將近百年或達百年以上，具有重要的社會內容與鮮明的廣東地方色彩的藝術特點。它與廣東內地某些同型歌謠，有着某種血緣關係。

書中對澳門大學學生梁明豔記錄的一首在澳門廣泛流行的〈一歲嬌〉，以它為主，進行仔細的思想和藝術分析：

一歲嬌，
二歲笑，
三歲攪柴過田阿媽燒，
四歲扛(舉)起油燈盞，
五歲織得好幼蘇，
六歲做(繡)出牡丹花，
七歲煮飯兼煮鯪(菜)，
八歲留毛九歲嫁，
十歲抱仔做阿媽。

他分析此童謠“主旨是反映近代農村女性一歲至十歲的生活經歷，也反映了一些早婚陋習。藝術形式是十句頭體。(……)表現手法綜合採用數位法與排比法，(……)語言淺顯、明快、形象，全用白描式的直敘，歲數不一定是實指，所敘事實有誇張色彩，按數目順序，有助幼兒記憶。”做了全面的思想和藝術分析。

同時他又聯繫近鄰深圳、新會的兩首異文進行比較，發現最後兩句深圳的異文是：“九歲留髮十歲嫁，十一歲抱仔做阿媽。”而澳門的則是：“八歲留毛九歲嫁，十歲抱仔做阿媽。”書中說：“澳門說結婚與生子比深圳各早一年。(……)互相比較後，可推知深圳童謠與澳門



童謠長期以來有過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影響，二者屬於同一類型的童謠文化圈內，故好些歌句相近，乃至完全相同是自然的。”（97頁）

他又比較新會的異文，發現第五句是“五歲績得好幼蘇”，而澳門則是“五歲織得好幼蘇”，有一個字不同，卻可以看出這首童謠是由新會流傳到澳門的。

為甚麼呢？書中引證了兩千年前《詩經》的〈陳風·東門之枌〉中的一句詩：“不績其蘇，市也婆婆”，這“績蘇”是把蘇撚成線，而澳門的“織蘇”則是指織布，這是現代的語言，可見新會的異文更加古老。加之，這一首澳門兒歌的口述者劉鳳娣是新會人，很可能是她把這首兒歌帶到澳門的。從新會到澳門，“澳門人改了一個字，便在澳門流傳，是當地語系化了，自該承認是澳門人的創作。”（頁98）

書中還對新會的另一首〈一歲嬌〉異文以及大埔、梅縣、中山乃至雷州半島湛江市的八九首同型兒歌做了細緻的比較、分析。有的差別很大，如湛江的那一首，在第十句以後，又有許多內容：

一歲嬌，二歲嬌，三歲攬柴鉤娘燒，
四歲搓幼蘇，六歲針剪一起拿，
七歲領人話（說媒），八歲領人茶（訂婚），
九歲領人禮，十歲歸（嫁）人家。
歸了二年三個月，打破家婆一隻菊花盅，
大官（哥）叫打，二官（哥）叫拖，
三官要寫退婚書。
（……………）

這是描寫結婚之後所受到的種種壓迫，都是舊社會婦女普遍的遭遇，具有很大的典型性。譚兄認為，這首童謠用生動的語言，把一個農村小女孩的成長過程，描寫得非常可憐，反映了農村童養媳和早婚的現實，是非常真實的：

它飽含着民間的智慧和情趣，因而才能在相當廣闊的地區內的廣大兒童和部分成年人口

頭上流傳，長期而不衰。過去澳門民間無名作者在不能掌握文字技巧的年代，竟能創作出反映舊時代女性童年成長過程及婚後痛苦生活的史詩性質的口頭童謠，我們不能不深深敬佩澳門人的文學天才。（頁102）

此外，本書對〈賣懶謠〉和澳門的謎語、諺語也做了很好的比較和分析。我們從書中那麼多異文和有關於歷史資料的分析中，深深地感到譚達先博士幾十年來辛勤治學的非凡功力。空洞洞的所謂理論文章好寫，而實實在在的歷史分析和比較研究，卻需要大量事實和文獻的根據。這是“乾貨”，絕非空口白話所能糊弄過去的。

這些珍貴的歷史、異文資料來之不易，所以很有參考價值。

譚達先博士著作等身，有幾十本，但是他對寫澳門的這本卻情有獨鍾。

甚麼原因呢？就是因為他對澳門很有感情。

2007年3月1日他在給我的一封信中深情地說：“時常想念，時常忘不了在澳門的日子。”這離他去世已不到一年。他始終懷念我們在澳門的合作。我們都迷戀民間文學，心心相印，合作非常愉快。這在別人，可能是難以理解的；對我們卻可以說是患難之交，相濡以沫，能在一起合作，是難能可貴的大好事。正如他此信中說的：“我的一生，是悲劇性的，（……）是個窮文人，為了民間文學一生受苦，文人不易為也。”

在困難之中友誼最為重要。所以他在澳門，花了很大力氣，去編選、去註解，我們合作，終於完成了《澳門民間故事集》、《澳門歌謠、謎語、諺語集》兩本書，至今也未能出版。我們許多的努力，不能得到社會的理解，在大陸出書沒有稿費，還要自己出錢，那真正是一個悲劇。

當然，金子總是會發光的，我相信，這兩本書一定能在澳門出版，這些澳門人民的口頭文學創作，一定會得到澳門人的珍視。

最近，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正在編輯出版幾套民間文學叢書，其中就有《中國民間故事全



書》、《中國歌謠全書》。澳門也是要編選澳門卷出版的，這兩本書可以作為一個基礎。

我深深地知道，民間文學雖然是文學的根基，然而，一般人卻對它瞭解極少，所以很不受重視。這是非常可惜的。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驚醒了世人。我國早已加入此條約，並已掀起了一個全國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高潮。

澳門當然也不能例外，可喜的是澳門文化部門一貫是比較重視民間文藝的。我相信澳門政府文化部門依靠專家和廣大群眾，一定能搞好這項重要的工作，甚至比內地搞得更好。

非物質文化其實就是民間文化。我想這兩本書的出版應該是指日可待的。這也是譚達先博士所翹首盼望的吧！

澳門文化司署（今文化局）重視民間文藝，曾批准了我的一個澳門民間文化的研究課題。我得到了好幾萬圓的調研經費，寫成了澳門節日和衣食住行民間文化的調查報告，交給文化司署收藏。

我知道譚兄的經濟並不寬裕，而澳門的民間文學也需要有人研究，譚兄是最合適的人選，於是我就請他在澳門也申請一個課題。他當時還不知道每年都有文化研究的課題招標。我介紹了我的經驗。他果然抓住機遇，申請到一個課題，得到了近十萬元經費，除必要的開銷外，還剩餘幾萬圓，他就利用這幾萬圓，在大陸出版了好幾本書。如《中國兩千年民間故事史》、《譚達先民間文學論文集》、《論中華民間文學》等等。

現在我們搞市場經濟，出版社向錢看，印數少的學術書的出版，不但沒有稿費，而且還要給出版經濟補貼，所以要出書，作者的負擔很重，達先兄為了出書，祇好節衣縮食，但是他卻樂此不疲。

年過八十以後，已進入耄耋之境，應該頤養天年了，而譚兄卻仍然每天凌晨三四點鐘就起床寫作，像一個辛勤不歇的老農，在民間文學的園地裡兢兢業業地刻苦耕耘，最後得了癌症，仍然忍痛堅持寫作。他在給我的幾封信中，每一封都

提到《回憶錄》和《中國三千年笑話史》。就是在八十二歲以後，他在風濕病、癌症（肝癌）的折磨下，堅強地挺住，堅持寫作，終於完成了回憶錄，即將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千年中國笑話史》終於未能寫完，祇寫到漢代就撒手而去，留下了三千年遺恨，令人無限惋惜。2007年7月17日他給我寫信說：

醫生發現我肝部有硬塊，是脂瘤，抑肝癌，檢查了幾次看不明白，過十天，再檢查兩天，才知詳情。（……）目前祇想把《回憶錄》最後部分在“仙逝”以前寫出，（……）待病情確定，可以脫身即回澳門取錢匯鍾偉兄暫存，作為出《回憶錄》之用。我是窮文人，無退休金，印書得自費，哀哉！

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譚兄念念不忘的，還是出書，還是民間文學，還是澳門，要抱病回澳門取錢，供出書之用。

半年之後，2008年3月1日，譚達先博士於澳大利亞悉尼市的醫院仙逝，享年八十三歲。

逝世前，他對女兒小梅說：

生命不在長短，在乎做點造福於當代與後代的事，在乎自己的任務完成得怎樣！

他把弘揚中華民間文學作為自己畢生最崇高的任務，甚於自己的生命。

他臨終第一次斷氣時家人呼之不應，女兒小梅對他講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將出版他的《論中華民間文學》和《回憶錄：尋夢——一個走向民間文學宮殿的行者》，他就緩過氣來，嘴唇微微顫動，想說而沒能說出，如此者三次。小梅說：“書好像是爸爸的生命！”——誠哉斯言！

《澳門民間文學研究》已經出版，對他對我們都是很大的安慰。我相信，《澳門民間故事集》和《澳門民間歌謠、謎語、諺語集》也一定能出版的。達先兄，澳門在呼喚您：魂兮歸來乎！